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 美国在中国西藏的“游戏”

——20世纪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研究

李晔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春

本书系东北师范大学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代号: 01BSS008) 成果

## 目 录

<b>导 论</b> .....	1
第一节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关于 20 世纪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 主要观点之我见 .....	16
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22
<b>第一章 西藏与古代中国历史关系的形成暨 “西藏问题”的由来 .....</b>	24
第一节 吐蕃王朝及其建政前后西藏与中原之间 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	24
第二节 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辖 .....	29
第三节 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西藏的侵略 .....	41
第四节 西姆拉会议与“西藏问题” .....	54
<b>第二章 20 世纪初期美国对中国西藏地位的 双重承认政策 .....</b>	64
第一节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对中国西藏的 早期接触 .....	64

第二节 20世纪初期美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统辖权 .....	77
第三节 模糊承认英国提出的西藏“宗主权”论 .....	84
<b>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涉足中国西藏 .....</b>	<b>87</b>
第一节 美国开始关注西藏的战略地位 .....	87
第二节 中国捍卫西藏的主权与美国的 “不卷入”政策 .....	102
第三节 从“二战”的需要出发，美国最终采取 尊重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政策 .....	112
<b>第四章 冷战与美国西藏政策的转变 .....</b>	<b>118</b>
第一节 美国阻止新中国接管西藏 .....	118
第二节 美国阻止和平解放西藏和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	133
第三节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争 .....	149
<b>第五章 援助西藏分裂“抵抗力量” .....</b>	<b>162</b>
第一节 把美国西藏政策纳入远东战略重点： NSC5913计划的出台 .....	162
第二节 美国对达赖喇嘛及其流亡分裂势力的 援助活动 .....	168
第三节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与美印的 “西藏合作”计划 .....	183

---

<b>第六章 美国策动“西藏问题”国际化</b>	195
第一节 美国建议达赖喇嘛从“人权”角度	
向联合国提出申诉	195
第二节 美国推动联合国支持西藏“民族自决”	202
第三节 美国在联合国策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210
<b>第七章 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调整</b>	221
第一节 美国对“西藏计划”援助资金的削减	221
第二节 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新变化	226
第三节 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	
“西藏人权”问题	238
<b>第八章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西藏牌”</b>	245
第一节 美国国会对西藏事务的立法干涉	245
第二节 “西藏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	255
第三节 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症结何在	271
<b>附 录</b>	
附录一 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全文	279
附录二 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全文	281
附录三 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全文	284
附录四 1907年《英俄协约》全文	289
附录五 1908年《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全文	291
附录六 1914年“西姆拉条约”及附件	296

附录七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全文	305
附录八 1959 年第十四届联大决议文件译文全文	309
附录九 1961 年第十六届联大决议原始文件 译文全文	310
附录十 1965 年第二十届联大决议原始文件 译文全文	311
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大事记（1901—2000）	312
参考文献	340
后记	364

## 导 论

### 第一节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综述

20世纪美国对中国西藏的政策，在本质上是美国对中国西藏主权地位的认识和遏制、分裂中国的问题。美国如何制定与实施对中国西藏的政策直接关涉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关涉中国主权安危的核心利益。因此，它不仅是一个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关涉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的核心利益问题。

笔者从可以查询到的史料得知，国外人士叩响中国雪域高原的门扉始于17世纪20年代。那时有几批欧洲天主教教士从喜马拉雅山或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后藏等地长期传教。他们学习和研究藏语，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调查，介绍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这是西方人对藏族研究的开启阶段。这类研究从匈牙利人德兹索·乔玛<sup>①</sup>开始。

在18世纪中叶以后的100年里，西方人对中国藏学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他们大多是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游历者或探险家。尽管那时的西藏贫瘠遥远、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但是西藏的山川风物、民生俚俗、医药饮食、宗教传承乃至天文历算，都对西方工业化大都市的人

<sup>①</sup> 德兹索·乔玛（Korosi Csoma, 1784—1842）：匈牙利语言学家、东方学家，国际藏学研究的先驱、西方世界第一位藏学家。为了纪念这位学者，匈牙利学术界出版了他的全部遗著，重印了几种经典性著作，创立了乔玛学会，设立了乔玛奖学金。

们具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它吸引着西方国家上至政客学者、下至商贩游客，尤其是那些不畏艰险的传教士们，越过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山脉，进入西藏地区传教。他们对西藏的研究反映在他们对中国西藏的最早的游记记述中。这些人大多出于对中国西藏宗教、地理和文化的好奇，抱着所谓“西方文明人”的心态，来到藏区探险和旅游，然后将他们的真实感受和亲眼所见记录下来。这些游记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西藏风土人情和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成为吸引更多怀有不同目的的西方人来西藏考察、探险、传教的诱因。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英、俄帝国主义对中亚的激烈争夺中，英国东印度公司企图打开中国西藏的门户，向中国内地输出商品。当他们的企图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西藏地方势力的抵制后，英国殖民者便依靠武力东侵西藏，强行打开西藏的大门，致使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些民族地区被西方国家控制。许多西方人士趁机潜入中国西藏，从寺庙拿走或盗走大量的文物、经书和藏文典籍，致使大量藏文文献流入西方。

这一时期的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便是西方掠夺者的代表。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三次亲历中亚探险。他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是法国东方学家。1906年，伯希和担任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到新疆和中亚地区进行学术探险。1908年2月，伯希和来到敦煌，以500两白银从王圆箓手中换取了一批藏经洞文物，总计10箱，大约5000件写本和绢画，大部分通过海路运回法国，自己随身携带1箱辗转至河内。运到巴黎的这批文物全部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sup>①</sup>这些文献资料客观上推动了藏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有一大批专业学者加入藏学研究队伍，研究内容也从藏语文拓展到西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诸多领域。

这一期间，英、法、德、意、俄、匈等国都有一批藏学家，法国和

<sup>①</sup> 樊光春. 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 [J]. 中国道教, 2008 (5): 46.

意大利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日本和美国后来者居上，西方藏学研究的领域有所扩大并且逐步走向深入。

应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欧美大部分学者的藏学研究愈加带有为政治服务的色彩。这个时期西方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最早研究的宗教和历史文化内容直接服务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与分裂活动，特别是服务于英、俄帝国主义提出的西藏“宗主权”理论，试图培植西藏亲英、亲俄势力，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使西藏成为一个英、俄在中亚和南亚争夺中的所谓“缓冲国”。这时西方的藏学研究范围已经从原来的宗教、历史和文化方面扩展到政治领域，集中表现在为鼓动西藏脱离中国，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为此制造理论根据和法理依据。从政治观点来看，西方学者大都不太顾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真实记载，而是站在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上，或者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或者坚持所谓“西藏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就脱离了中国，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或者模糊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而间接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这些认识上的偏见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宗主权”佐证为当时的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和后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分裂势力在国外的分裂活动制造了所谓“合法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冷战的开启、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西方学者的藏学研究政治色彩渐浓。1959年达赖集团出逃时携带的大量藏文图书档案和重要西藏历史文献成为当代国外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达赖集团还向联合国提出所谓“西藏地位”问题，这些在客观上刺激了藏学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国家成立了专门的藏学机构或团体，如日本西藏学会、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西藏学会、英国西藏协会、锡金藏学研究所等。一些学术机构发行专门的藏学研究刊物，如《日本西藏学会会报》、《藏学集刊》、《西藏学会会报》、《西藏学会通讯》。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国外藏学界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为冷战和遏制中国而服务的倾向，在“古代西藏的历史地位”、“中国民国时期西藏的地位”、“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的人权”、“西

藏民族自决”等问题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认识。认识偏颇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近代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非法条约和所谓的“宗主权”理论。“宗主权”理论又可以分为“西藏民族自决”论和“西藏民族高度自治”论（“大西藏”论）等。他们运用的历史档案和参考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否定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西藏历史地位的真实记载，有意夸大中国政府已经纠正了的在西藏出现的极“左”错误，甚至把在中国早已被批判多年、遭到亿万人民唾弃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口号和行动作为其谬误的根据。

随着美国外交文献的不断解密和大量国外网络数据库的引进，这一问题的研究被越来越多的学人关注；随着我国学术研究思想的解放，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不断改进，该领域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并且逐步走向纵深。国内外已有一批记述美国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和西藏地位问题的论著发表。概括起来，国外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着力避开敏感的如“西藏地位”等政治问题，比较客观地论述中国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医学院人类学和西藏研究中心教授梅·戈尔斯斯坦（Melvyn C. Goldstein）<sup>①</sup>著有代表作《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sup>②</sup>。书中主要叙述了农奴制在西藏覆亡和政教合一体制结束的历史及其根本原因；阐述了美国插手西藏事务的问题；运用了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比较翔实地阐述了从“二战”期间开始至1951年的西藏和

① [美] 梅·戈尔斯斯坦（1938—）：1938年2月8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市。1959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戈尔斯斯坦以《西藏的僧兵（ldab-ldod）研究》论文获得密歇根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58年，戈尔斯斯坦以《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获得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其为“世界一流的西藏研究专家之一”，是西方藏学界的“西藏通”。

② [美] 戈尔斯斯坦. 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M]. 杜永彬，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

1989年，本书英文版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20世纪中国最佳图书奖——约瑟夫·利文森奖”荣誉奖。

平解放，西藏喇嘛王国灭亡的历史过程和美国政府秘密卷入西藏事务的历史事实。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梅·戈尔斯坦又对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藏族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藏族的论著。戈尔斯坦在藏学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历史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三个方面。戈尔斯坦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又如著名加拿大籍学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pire State College) 历史学教授谭·戈伦夫 (Tom Grunfeld)<sup>①</sup> 的《现代西藏的诞生》<sup>②</sup> 一书，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西藏的自然地理、民族社会组成等概况，记述了西藏自松赞干布起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作者在阐述近现代西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时论及了美国政府卷入和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诸多活动。2000 年 8 月，他在参加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时提交了学术论文《西藏与美国》 (*Tibet and The United States*)，再次补充了其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未涉及的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历史内容。

第二种类型。运用大量美国的外交文献和档案资料，比较翔实地介绍了美国政府卷入西藏事务的历史过程。作者不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直言评价中国西藏的地位问题。这类学者认为，美国卷入西藏地位问题是出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例如：美国学者 N. C. 霍尔 (N. C. Hole) 的《美国、西藏与中国》<sup>③</sup> 回顾了自清末以来美国人进藏的历史，着重叙述了美国人自“二战”以来卷入西藏地位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以及历届美国政府对西藏政策的变化和原因。美国学者威尔纳·艾伯特·西格弗里德 (Willner Albert Siegfried) 在其博士论文

① [美] 戈伦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历史学教授，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和纽约大学。

② [美] 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M]. 伍昆明，王宝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③ [美] 霍尔 N.C. 美国、西藏和中国 (USA, Tibet and China) [J]. 成军，译。西藏评论，1978 (1)。

另载：[美] 霍尔 N.C. 美国、西藏与中国 // 张植荣. 20 世纪的西藏：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10 辑 [C].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西藏，1953—1961：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制定》<sup>①</sup> 中，使用的最主要的档案资料有白宫备忘录，美国国务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报告，以及美国与中国西藏、印度、中国台湾当局之间的交往记录，还使用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相关文件。作者叙述了1959年美国在本土对西藏流亡“抵抗力量”进行培训，指导其在西藏从事反华活动的情况。论文分析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在相关政策发展中的影响，评估了美国国内参与者的认知及其影响，还论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和5412小组等机构的相关活动。文章还考察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形成过程以及对美国西藏政策的发展产生的特定作用：美国的政策或明或暗地向西藏提供有限的支援，利用涉藏事务并使西藏政策从属于在亚洲其他更重要的利益。美国学者田东东（Tian Dongdong）在其博士论文《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美国政策制定》<sup>②</sup> 中指出，美国在改善对华关系后，西藏地位问题给美国的决策者带来了一种两难的困境：支持西藏的“民族主义者”（笔者按：指西藏分裂主义者）会危害美国在维持对华友好关系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忽略西藏人的请求，则可能会给决策者们招致忽视美国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的批评。这篇论文介绍了1971—1993年期间美国政府是如何处理这种两难困境的。论文还分析了历届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转变的背景下应对这种困境使用的策略和方法。文章指明，为应对这一困境，美国历届政府选择在中国政府与西藏“民族主义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的政策，使决策者们既维护了美国在对华关系上首要的国家利益，又忠实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在这一平衡中，体现的是政策实用主义。美国学者卡罗尔·麦克格拉纳翰（Carole Mcgranaham）的近作《西藏的冷战：中

① SIEGFRIED W A.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ibet, 1953 — 1961: Influence and the Making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D].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5.

② Tian Dongdong. The Tibet Issu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Policy-Making since Rapprochement [D].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1995.

央情报局与“四水六岗卫教军”的抵抗力量（1956—1974）<sup>①</sup>记述了“四水六岗”的西藏流亡“抵抗力量”的起源，他们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及其在1974年放下武器的最后结局，以及今天还遗留在西藏流亡者群体中的痕迹：反对中国军队的游击战不仅在中国西藏，还扩展到印度、尼泊尔以及美国。

应该说，第二种类型中的美国学者的著述特点是以记述史实为主，材料比较翔实，基本上能够相对客观地论述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美国政府与中国西藏的关系。作者的观点接近客观，但是仍然因受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局限，在认识上和文献资料的取舍上存在着某种偏见和认识误区。

第三种类型。从冷战思维出发，站在遏制中国和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片面利用美国的档案资料或美国中央情报局当事人的资料，不顾及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和事实真相，论述了美国政府和情报系统卷入西藏事务，支持达赖喇嘛流亡分裂势力的历史。这类著述主要有：美国学者克里斯·穆林（Chris Mullin）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sup>②</sup>；美国学者L. 弗莱彻·普罗迪（L. Fletchey Prouty）的《秘密工作队：中央情报局及其盟友控制美国和世界》<sup>③</sup>；美国学者约翰·普拉多斯（John Prados）的《当代的秘密战争——“二战”后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秘密行动》<sup>④</sup>；美国学者肯尼斯·康波伊、詹姆士·莫里森（Kenneth Conboy & James Morrison）合著的《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争》<sup>⑤</sup>；美国学者约翰·肯尼斯·克努斯（John Knaus

① MCGRANAHAN C. Tibet's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Chushi Gangdrug Resistance, 1956—1974 [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6 (Summer): 102—130.

② 张植荣. 20世纪的西藏：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0辑 [C].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③ PROUTY L F. The Secret Team: the CIA and 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3.

④ PRADOS J. Present Secret Wars—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 Since W. W. II [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86.

⑤ CONBOY K, MORRISON J.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M].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Kenneth) 的《冷战的孤儿——美国和西藏为生存的斗争》<sup>①</sup>; 美国学者森·凯斯 (Sen Chunakye) 的《西藏的消失, 以文献为据的历史上的西藏国际地位, 大反叛及其后果》<sup>②</sup> 等。在他们的著述中, 记述了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事务, 秘密支持西藏叛乱和幕后支持达赖喇嘛流亡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还有英国学者莫赖斯·弗兰克 (Moraes Frank) 的《西藏叛乱》<sup>③</sup> 和印度学者 J. P. 米特 (J. P. Mitter) 的《西藏的叛乱者》<sup>④</sup>, 英国学者黎吉生的《西藏简史》<sup>⑤</sup> 和美籍荷兰学者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sup>⑥</sup>, 他们站在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上记述 1959 年西藏叛乱的过程, 为反共、反华, 遏制、分裂中国寻找根据。

应该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冷战的背景下, 国外研究“西藏问题”(即西藏地位问题)的主流是与英帝国主义炮制的西藏“宗主权”论相关, 与西方世界关注的“人权”、“民族自决”、“高度自治”论相连, 公开支持“西藏独立”论。他们的著述特点是以记述史实为主, 档案资料比较翔实, 然而他们的缺陷是由于受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价

① KENNETH J K.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ibet Struggle for Survival* [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② CHUNAKYE S. *Tibet Disappear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ibet'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great rebellion and its aftermath* [M]. New York: Asia Pub., 1996.

③ FRANK M. *The Revolt in Tibet* [M].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60.

④ MITTER J P. *Betray of Tibet* [M]. Bombay: Bombay Allied, 1964.

⑤ 休 E. 黎吉生 (Hugh E. Richardson, 1905—2001) 的《西藏简史》, 伦敦 1962 年版。李有义,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79 年印制。

黎吉生是英国插手“西藏事务”的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凯布勒 (Keble) 学院, 谱熟藏语文。1930 年, 进入印度事务部工作。1934 年, 在印度事务部的下属机构外交和政治部任职, 与英国锡金政治专员罗勒·古德 (Basil Gould) 相识。1936 年, 以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身份到达拉萨, 并任英国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1942 年, 赴中国重庆, 任英印驻华专员公署一等秘书, 代理署务。1944 年, 任英印政府外交部副秘书。1946 年, 任英印驻江孜商务专员, 兼任英国驻拉萨商务代办。1947 年, 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 担任印度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 直至 1950 年被驱逐出西藏为止。这一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有: 鼓动噶厦派代表出席于印度召开的“泛亚洲会议”; 在 1947 年的热振事件中, 支持大札摄政, 迫害爱国的热振活佛致死; 1948 年 1 月 31 日, 代表印度政府与西藏“外交局”会谈, 不许西藏代表团参加国民政府会议, 并要求由印度继承英国在藏的“义务”和特权; 1949 年, 煽动噶厦制造了驱汉事件。1950 年, 从印度内务部退休回国。

⑥ [荷] 范普拉赫著作《西藏的地位》由中央统战部 1991 年印制。曾任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法律顾问, 是“西藏独立”的积极主张者和宣传者。

值观念和指导思想的制约，大多不触及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实质，不相信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述，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表示同情，甚至完全接受英帝国主义炮制的、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不是主权的理论，鼓动和支持西藏“民族自决”，支持少数西藏流亡分裂分子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我国国内的藏学研究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甚至遥远的古代。<sup>①</sup> 运用现代人文科学的手段，借鉴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国际政治（关系）学等新方法来研究藏学，则是近现代时期的事情。19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学者掀起了边疆研究的热潮。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这一研究的热潮经久不息。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觊觎，我国学者对边疆的研究带有深沉的忧患意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的觊觎和侵略成为我国有识之士藏学研究的新视角。他们握笔为戈，向世人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的阴谋。反对分裂、支持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例如在这一时期，在清廷曾任驻藏大臣的赵尔丰<sup>②</sup>就通过记述自己在西藏的经历来介绍西藏的一些基本情况，证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引起了国人对西藏地理和历史地位的关注。

20世纪30至4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在一些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趁机加紧进行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仍然是这一时期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完整，促进康藏同胞生活改善，推行切实之经济

① 刘洪记，孙雨志. 从报刊论文资料统计看中国藏学发展 [J]. 中国藏学，2002 (2).

② 赵尔丰 (1845—1911)：清末大臣，字季和。祖籍山东莱州人，生于辽宁铁岭。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任建昌道，旋任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设立30多县。1908年任驻藏大臣，率兵入藏，屡败受英国操纵的叛军，阻止了英帝国主义北进的阴谋。1911年4月，调署四川总督，镇压保路运动，屠杀请愿民众，激起四川省各县人民的武装反抗。武昌起义后，被清廷撤职。同年11月27日，宣布四川“地方自治”，以“办理边务”名义拥兵督署，从中煽动并操纵兵变。同年12月22日，被都督尹昌衡杀于成都贡院。

建设的愿望，这一期间在四川大学任教的任乃强教授<sup>①</sup>等联名向全国各地发出了成立康藏研究会（社）的倡议，并很快得到了国内边疆学者的热烈响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大量学术研究机构也随着西迁的洪流来到我国西部地区。随后，各种学术期刊在后方涌现出来，许多社会学、民族学学者深入西藏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1946年夏，参加康藏研究社的汉、藏、蒙、彝、回等民族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社会、经济、语言、宗教、考古、民俗等学科的专家、学者有近200名。<sup>②</sup>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藏学家。这些有关藏学的教学、研究机构的成立，推动了国内对藏区社会、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研究，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对于巩固中国对西藏地方的统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西藏的特殊情况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党和国家对于西藏工作一直给予极大关注，西藏及整个藏区的解放与发展问题被列入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议事日程。以西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藏学研究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中国藏学家、学者受聘到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和教学单位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系统开展藏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许多高校和研究机关的藏学专家赴西藏对藏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哲学、音乐戏剧、建筑雕塑等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建设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专门组织了数十个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组。西藏组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对西藏的地理、历史、社会制度、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交通、物产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考察。这为后来的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

① 任乃强（1894—1989）：字筱庄，四川南充人。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曾任重庆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和中国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② 刘洪记，孙雨志. 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 [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768.

础，使我国的藏学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sup>①</sup>与此同时，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从亚洲冷战和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出发，取代英国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积极支持者。这一期间的藏学研究与国际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我国藏学研究紧紧围绕捍卫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研究范围随着“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和1959年平定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叛乱、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等项工作的需要进一步得到拓宽。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间，我国的藏学研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致使藏学研究工作几乎中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大门也向国外学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者进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藏学家到国外讲学、开会、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外的藏学研究。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委员会编辑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中有关西藏部分内容的陆续解密，美国、英国和印度等一些国外档案文献网络数据库的开放，为该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藏学研究发展迅速。中国设立了中央及地方各级藏学研究机构50多个（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台湾西藏研究会等），创办了《西藏研究》、《中国藏学》、《中国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西藏社会发展研究》、《西藏艺术研究》等30多种藏学学术期刊，专门成立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藏文古籍200多种和一批藏学研究学术成果。每年还召开数次规模不等的藏学讨论会。北京、四川、西藏等地的藏学研究机构先后正式成立并开展工作。他们深入研究藏学，特别是研究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的历史，持续批驳“西藏独立”思潮。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中国藏学家也应邀出国访问、讲学和交流学术。

<sup>①</sup> 刘洪记，孙雨志. 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 [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768.